

楊宗翰

串連東西，銜接台外

——擺渡人顏元叔的再定位

一、敬悼「擺渡人」顏元叔

2012年12月中旬，拙著《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印行上市。這本書旨在追索台灣新詩評論之「起點」、「變貌」及兩者間的中介接點「轉型」(transformation)。書中將「新詩話」的誕生與「詩人批評家」的出現，視為台灣新詩評論的真正起點。從日治時期到一九五〇年代建構出的詩人批評家樣貌與印象式批評手法，到了六〇年代面臨英美「新批評」(New Criticism)之強力挑戰——後者的代表人物有二，一為來自「民間社會」的李英豪，一為來自「學院建制」的顏元叔。在他們積極評介下，台灣新詩評論遂正式「轉型」，連帶提升並凸顯了「詩評家」之獨立位置。

在李、顏二人出現以前，台灣的讀書界與文化圈對「新批評」並非一無所知——因為還有位集教授、編輯、翻譯家、評論家於一身的夏濟安。李英豪於1966年出版《批評的視覺》，書中各篇分別寫於1962至64年間，是台灣第一部全力介紹、推廣與援用新批評手法的中文書籍。不過，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夏濟安已在台大課堂、《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上，刊登過零星幾篇關於「新批評」的翻譯與介紹。其中尤以1956年10月《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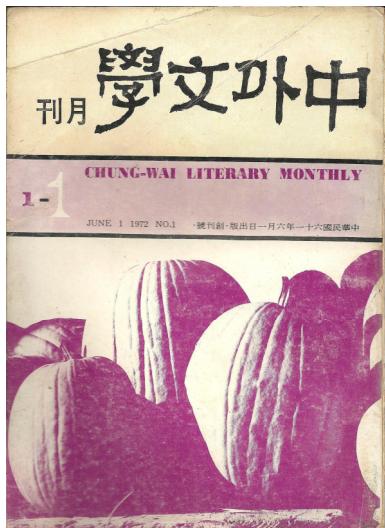
雜誌》一篇〈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允為最早以新批評手法進行現代小說評論的示範。可惜夏濟安英年早逝（1916-1965），來不及讓影響力更為擴張與延伸。另一位學者陳世驥，則是將新批評方法應用在中國古典詩歌上，對學院內的古典詩歌研究者深具啟發。夏濟安的學生輩如詩人葉維廉，在攻讀於台大外文系以及師大英語所期間，便開始翻譯艾略特（T. S. Eliot）《荒原》並撰寫〈艾略特的方法論〉、〈靜止的中國花瓶——艾略特與中國詩的意象〉、〈詩的再認〉等¹¹，在新批評理論的引進上自有其貢獻。但無論是夏濟安、李英豪、陳世驥或葉維廉，他們都始終無法像顏元叔一樣，悠遊於中／外文系所及學院內／外，並迅速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取得影響，言行舉止與學術判斷更屢屢造成眾人震撼。這是因為顏元叔雖稍晚出現於評論界，但透過他在台灣大學與淡江文理學院推動的教學改革，以及不吝於各式報刊上撰文發表評論、筆戰群雄，終於後來居上成為「新批評」代表性評論家。雖然爭議不歇且反駁者眾，但我們必須肯定顏元叔替新批評之「位置攫取」（position-taking）卓有貢獻。今日之讀者與評論家接受新批評術語時幾乎已臻「不證自明」，代表著新批評對台灣文學評論的影響已深入根蒂——顏元叔四十年前的付出與努力，畢竟沒有白費。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廿六日，顏元叔因肝癌不幸逝世，距拙著《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印行上市僅隔兩週。誠如筆者在書中所言：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間，顏元叔在封閉的台灣評論界演著串聯東／西、銜接台／外的「擺渡人」角色，提供了分析方法、轉運了理論資源、增益了詩學新知，貢獻不可謂之不大。進一步說，若沒有「擺渡人」顏元叔對英美新批評之全力提倡，對作品細讀之躬自實踐，對中外文學教材及研究方式之堅持變革，台灣的「文學學」很可能不會是今天這個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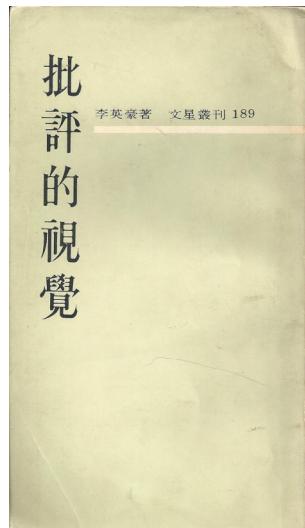
但他畢竟還是走了。余光中所撰之紀念文章提及：顏元叔「『離開』我們已經太久了，令我們失望而不能諒解。……不時聽人轉告，說他去了對岸某處，正卜宅安居，又說他已回來台灣，現正養病。那麼悠長的歲月，這世界早已變得難認，偏他，不回學府也就罷了，卻連文壇也一起棄了，

¹¹ 葉維廉的碩士論文也是以艾略特詩學為研究主題，即 T. S. Eliot: A Study of His Poetic Method (English Institute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961)。

犯得著嗎？」² 關於顏元叔當年為何提早「離開」的原因版本眾多，我以為其中饒富戲劇性——若是因筆戰後怒氣未消「老子不玩了」，至少還算帶有王禎和式的喜劇色彩；若是受「台大哲學系事件」牽連，囿於政治因素而不得不「轉戰」，那無疑就是悲劇了。



中外文學，1972 年創刊號。
(本文書影由應鳳凰教授提供)



李英豪，批評的視覺，1966 年。

從喜劇抑或悲劇的角度來觀察，或許更能彰顯出顏元叔的雙面性。他的熱情「火」起來可以燒遍一九七〇年代的古典詩界與現代詩壇，對論敵一個也不容赦；他的執著「拗」起來倒也愛恨分明，八〇年代後毅然朝散文創作及英語教育轉向，評論健筆迅速變身為辭海專家。最令人驚訝的是，顏元叔晚年曾在自己與胡耀恆等學者創刊的《中外文學》上，藉回顧《中外》歷年發展之機會，撰文嚴詞批判「美帝」帶來的錯誤觀念與影響。顏氏從六〇年代末期起，就是台灣學術界引進英美「新批評」的重要旗手；誰能料到這位四十年前「『美帝』代言人」晚年幡然悔悟，竟在外文系地盤突兀地捍衛起中華道統與文化傳承？

² 余光中〈顯極忽隱，令人惆悵〉，《聯合報·聯合副刊》2013年1月23日。

二、顏元叔與英美新批評

在台灣的文學評論歷史舞台上，顏元叔扮演著串聯東西、銜接台外的「擺渡人」要角，為六〇年代末至七〇年代頗缺氧氣的封閉文壇，轉運了重要的理論資源與文學新知。彼時「新批評」在英美早已不「新」：它肇始於一九二〇年代的英國，繁榮於三〇年代的美國文壇，二次大戰後邁向顛峰，儼然是現代批評的代言者。五〇年代末期，「新批評」漸成強弩之末，遂被更「新」的批評理論給逐步取代。明知不「新」卻堅持引進，顏元叔在〈新批評學派的文學理論與手法〉中說明了自己的理由：

今日甚至有人說，新批評已經死亡，似乎是聳人聽聞的戲謔語。實則，新批評學派的理論與手法，經過數十年的傳播，已經深入文學研究的領域，變成一種理所當然的方法；只是不如其全盛時期的囂張而已。我個人曾經深受新批評的影響；我的博士論文「曼殊菲爾的敘事觀點」，即是用新批評的手法寫成的。不過，近三兩年來，我也對新批評學派抱持著批評的態度，因為我覺得新批評過份侷限於形式和美學的討論，忽略了文學的外在關係。然而，無人可以否認——包括反對新批評學派最激烈的亞里斯多德學派在內——新批評的理論與手法，作為文學的內在研究，仍然是最好與最有效的途徑。³

在顏元叔以中文撰寫的著作裡，這篇應該是對英美新批評最早的整體性介紹。他從 1966 年學成歸國後，同時任教於兩所外文系學術重鎮，並自 1969 年開始接掌台大外文系主任一職。他在任內與文學院朱立民院長合作，全盤革新大學的文學教學與文學研究：

一、在課堂上大量採用原文教科書，連帶促使西洋文學理論成為外文系教學主流。⁴⁴

³ 本文原刊於 1969 年 1 月至 3 月號《幼獅文藝》)，後被收入顏元叔《文學的玄思》(台北，驚聲文物，1970：109-161)。

⁴ 如 Cleanth Brooks 與 Robert Penn Warren 合編之《理解詩歌》(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與《理解小說》(Understanding Fiction, 1943)，Cleanth Brooks 和 Robert B. Heilman

二、授課時特別注重作品本身結構與字質 (structure and texture) 分析，對過往偏重印象式批評或歷史傳記批評的文學研究界形成巨大衝擊。

三、籌辦第一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與《淡江評論》(Tamkang Review)，1972 年還與胡耀恆等人創刊《中外文學》。

大學校園內畢竟影響人數有限，這位新批評的引渡者遂另闢戰場，頻繁出版新書並躍上媒體發聲。扣除他自 1974 年《人間煙火》後陸續出版的十七部散文集⁵，他的文學評論著作計有七部：

- 一、《文學的玄思》(台北：驚聲文物，1970)
- 二、《文學批評散論》(台北：驚聲文物，1970)
- 三、《文學經驗》(台北：志文，1972)
- 四、《談民族文學》(台北：學生，1973)
- 五、《何謂文學》(台北：學生，1976)
- 六、《文學的史與評》(台北：四季，1976)
- 七、《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台北：巨流，1978)

顏氏的文學評論，精神皈依於十九世紀人文主義者阿諾德 (Matthew Arnold)，方法則擷取自英美新批評——特別是他推崇備至的艾略特 (T. S. Eliot)。為紀念與表揚 Eliot 對歐洲文學的貢獻，顏元叔還力倡將坊間譯名「艾略特」統一改為「歐立德」。在他二度赴美撰寫博論前後，1965 年 8、9、10 月號《大學生生活》上連載了〈論歐立德的詩〉。這篇文章再加上他歸

合編之《理解戲劇》(Understanding Drama: Twelve Plays, 1945)，以及 Cleanth Brooks 、 John Thibaut Purser 、 Robert Penn Warren 《文學入門》(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 1936)。

⁵ 或許是因為在文學評論上的鋒頭太健、爭議又多，顏元叔的散文家身份常被人遺忘。從 1974 年皇冠版《人間煙火》開始，至 1986 年九歌版《台北狂想曲》，顏元叔一共出版了十七部散文集，以量而論即不容小覷。顏元叔還有大量的翻譯出版品，最重要的是《西洋文學批評史》(1972) 與《歐立德戲劇選集》(1970)。《西洋文學批評史》即新批評大將 W.K. Wimsatt 與 Cleanth Brooks 合著之 Literary Criticism: A Short History ，面世後多年來一直是本地文學系所學生必備書籍。

國任教後撰寫的〈歐立德與艾略特〉、〈歐立德的詩劇——音響與字質的研究〉，字裡行間在在可見作者有意在台推廣及鼓吹 Eliot 之文學理念。



顏元叔，文學的玄思（1970年）、文學批評散論（1970年）。

顏元叔，談民族文學，1973年。

在顏元叔現身「佈道」以前，李英豪、余光中等人都介紹過 Eliot 其詩、其文、其人、其論，坊間亦早有不少相關譯介。但以顏氏在台灣學術界的身份與位置，加上對課堂學生及媒體讀者的廣泛影響，對六〇年代後期起艾略特成為台灣人心目中完美的西方正典（canon），確實起了關鍵性的臨門一腳。筆者以為，艾略特之所以能夠成為彼時台灣人心目中完美的西方正典，與他晚期的形象不無關係：保守派、古典主義者、英國國教信徒——還有，絕對不是國民黨頭痛的左傾份子。

三、顏元叔與實用批評

我以為顏元叔對台灣「新批評」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在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或譯為實際批評）。夏濟安或李英豪的實用批評文章，在累積量上絕對無法與他相比。發表量其實也是某種衡量曝光度、影響力的標準，無怪乎七〇年代人們一想到顏元叔，就會快速聯想到「新・批・評」三個字。但顏元叔也有他的堅持：為了調整新批評理論對文學外在關

係的忽視，他遂在文章中反覆強調文學與文化的關係，以及文學具有教育良心的特點。這算是替新批評的可能流弊，先打下了預防針。

在顏元叔的眾多實用批評中，以對古典詩的分析最惹人非議。他對中國古典詩的討論，計有〈中國古典詩的多義性〉、〈析「江南曲」〉、〈細讀古典詩〉、〈分析「長恨歌」〉、〈析「自君之出矣」〉、〈析「春望」〉、〈音樂的宣洩與溝通——談「琵琶行」〉等。這些文章一發表，葉嘉瑩、魏子雲、夏志清等人紛紛撰文表達否定之意。以西方文論討論中國舊詩其實並不新鮮，之前就有幾位「海外學人」嘗試此舉，如六〇年代的陳世驥、七〇年代的梅祖麟、高友工。一樣用新批評手法，或採語法、語義、聲韻分析，為何以中文撰寫的顏元叔就惹起這麼多爭議？其原因應與他喜好「唯性是問」頗有關係⁶：

(一)「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自君之出矣〉)有性影射，蠟燭與金爐分別成了男、女性器的象徵，只因「在西洋文學中，蠟燭是一個常用的男性象徵」，而「西洋文學中的杯狀物如聖杯 (the Grail) 等，被視為女性象徵，而金爐之形狀頗似聖杯，在此又和婦女有密切之關連，故可視為女性象徵」(頁 63-4)。

(二)「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江南曲〉)，因為「信」、「性」同音，讓他聯想到可能是雙關語；而「潮」字暗示女人的經期，也是女人性慾之週期。配合此詩前兩句「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顏氏得到這個結論：「『弄』潮的人必諳『潮』性；諳『潮』性者，必諳『妾』性；則『弄』字之含蓄與挑逗，實意內而言外。無怪乎這位能唱「江南曲」的少婦，後悔沒有嫁給他」(頁 77)。

(三)顏氏指出「梨花一枝春帶雨」(〈長恨歌〉)這行詩是白居易詩藝的結晶，佔據了總結全篇的地位。而「春帶雨」是指「一枝梨花開放在春雨之中，就暗喻而言，它的性影射是強烈的——而且也是充滿性之美的。『春』含育著由於性成熟或性慾求而產生的肌膚之光澤，『雨』更能顯示由於此類成熟或欲求而形成之潤濕」(頁 101)。

⁶ 以下四則皆引自顏元叔《談民族文學》(台北，學生書局，1984 年，第三版)。

(四)「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近試上張水部」），顏氏這次不當東方佛洛伊德了，但他卻認為這個題目「只說明了寫詩的場合，與詩的內容毫無關係」（頁 84），故擅自把詩題改為〈停紅燭〉。這篇作品在他眼中就是一首新婚詩，既不知此詩另有一題目〈閨意〉，亦不知《全唐詩話》已記載了朱慶餘欲以此詩請教張籍的故事。

由這四個例子可以看出，顏元叔的古典詩評論有兩項明顯缺點：太偏重以性心理學解詩，幾乎比佛洛伊德本人還要佛洛伊德；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修養太差，卻硬要強充解人，宛如手握強調模稜兩可（ambiguity，或譯為多義、歧義）的新批評寶劍，卻縮減了原詩的可能解釋。葉嘉瑩、夏志清等人對他的批評，大抵也集中在這些方面。

此外，顏元叔撰寫過多篇關於台灣現代詩的實用批評文章，如〈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梅新的風景〉、〈細讀洛夫的兩首詩〉、〈羅門的死亡詩〉、〈葉維廉的「定向疊景」〉等，並對葉維廉詩作情有獨鍾。他還發表〈對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審詩雜感〉等診斷與諍言，文中明確指出台灣現代詩的病灶：

- (一) 詩人的意象語過於跳躍，只求表現個人經驗，導致晦澀之作大增。
- (二) 作品缺乏嚴謹結構，有佳句而無佳篇。
- (三) 不去追求詩的內在形式，讓作品成為放縱和混亂的組合。

台灣的現代詩研究能夠逐步走向學術化之途，純作詩評論、並非詩人的顏元叔確實功不可沒。對台灣現代詩的批評，並沒有讓他受到太多責難；真正讓他被學界質疑的，還是對中國古典詩的解讀。因為他的古典詩解讀而引起的論戰文章計有：

- (一) 葉嘉瑩，〈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上）〉，《中外文學》，第 2 卷 4 期（1973 年 9 月），頁 4-24。
- (二) 葉嘉瑩，〈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下）〉，《中外文學》，第 2 卷 5 期（1973 年 10 月），頁 30-61。
- (三) 魏子雲，〈梨花一枝春帶雨——讀顏作「分析長恨歌」〉，《中華日報·中華副刊》，1973 年 6 月 29 日。
- (四) 夏志清，〈追念錢鍾書先生——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 年 2 月 9 日。

(五) 夏志清，〈勸學篇——專覆顏元叔教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年4月16-17日。

(六) 黃維樑，〈中國歷代詩話、詞話和印象式批評〉，《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年6月6-8日。

(七) 黃青選，〈批文入情〉，《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76年6月11日。

(八) 黃宣範，〈從印象式批評到語意思考〉，《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6年6月24日。

(九) 趙滋蕃，〈平心論印象批評〉，《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976年8月14-16日。

(十) 徐復觀，〈從顏元叔教授評鑑杜甫的一首詩說起〉，《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9年3月12-13日。

(十一) 徐復觀，〈敬答顏元叔教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79年7月16-17日。

彼時顏元叔「驚世駭俗」的閱讀結論與象徵分析，對古典詩圈內的專家們可說是一大挑戰（或該說是挑釁？）。爭議既多，謗必隨之，顏元叔有次誤錄杜甫詩作，消息居然躍登報紙版面，成了一則新聞（論敵眼中的醜聞？）。⁷ 我以為顏元叔或許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的修養不高，但他連在筆戰中都是個徹底的「新批評」實踐者。何以見得？葉嘉瑩在〈漫談中國舊詩的傳統〉中批評「現代解詩人」，卻又不點名是誰或是指哪篇文章。顏元叔就直指這種態度「並非現代文學評論之福」。除了態度問題，顏氏還認為葉嘉瑩犯了新批評的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而不自知，並以T. S. Eliot的「傳統」觀反駁葉嘉瑩對中國舊詩傳統的看法。

另一值得注意者，是1976年顏元叔和夏志清之間的筆戰，在文化圈引起轟動，甚至讓後起研究者斷定為兩人影響力消長的關鍵。夏志清因此成

⁷ 參見1979年2月21日《民生報》(〈顏元叔把詩抄錯 文壇裡掀起風波〉)或同年3月20日《中國時報》(〈國學師資缺乏教部應謀改善顏元叔教授誤錄杜甫詩觸發監委靈感慨乎言之〉)。

爲新的「文學導師」，取代了顏元叔原先在台灣島內的地位。⁸ 我對此種論點頗有保留。

整件事的起源，是顏元叔以〈印象主義的復辟？〉批評夏志清〈追念錢鍾書先生——兼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新趨向〉，認爲夏氏提倡的是「停留在十八世紀」的印象主義式批評，藉著追念（筆者按：此爲海外誤傳，彼時錢鍾書尚健在）錢鍾書來批評台灣的新批評與比較文學研究人士。夏志清又以〈勸學篇〉回應顏元叔〈印象主義的復辟？〉，他在文中強調自己讀過多少書、學過多少語文、授業老師是誰、甚至暗示顏元叔就讀的威斯康辛博士班之要求，遠不如夏氏自己的耶魯大學來得多——我認爲這些已淪爲賣弄，哪是什麼討論？夏志清彼時的氣度與格局，由此不難想像。

顏元叔倒是心平氣和地回了一篇〈親愛的夏教授〉，文中問讀者：「新批評應否在台灣推廣？」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他並說明：「我不是趕時髦的人，『新』與『舊』對我並沒有什麼差別；我們只是著眼於自身的需要而已」。除了新批評，當時（1976年）顏元叔在台灣還介紹了另外一些西洋批評理論「如新亞里斯多德學派，神話與原始類型派，及結構主義等」。其原因不是「新奇」，而在「有助於國內的學術研究，能夠刺激一些新活動，造成一些新成果，這也便是傳統的生長」。⁹ 對於這場筆戰，我以爲就算夏志清真的「贏了」，顏元叔藉由大眾傳媒來推廣新批評的目的已經達成——究竟誰才是「文學導師」或「文學批評界龍頭」，這樣看來也沒那麼重要了。

自顏元叔學成返台後，一方面在校園裡訓練青年學子，一方面在傳媒上搖旗吶喊，雙管齊下鼓吹「新」的批評手法，讓這遲到的（belated）「新批評」替台灣的文學評論界定下了新規則：揚棄模糊的感受與印象，要求精品細讀，講究字質、結構、方法、系統、整體與專業。配合彼時台灣當代文學想從「江湖」走向「體制」、從「民間」進入「學院」的強烈渴求，連外文系也不再自囿於「語文訓練」而朝向「文學研究」發展……，這些巨大變革的誕生，都與「擺渡人」顏元叔脫離不了關係。與他筆墨交鋒過

⁸ 如蘇益芳〈夏志清與戰後台灣的現代文學批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4：148-152）。

⁹ 顏元叔《談民族文學》（台北：學生書局，1984年，第三版：237、241、242）。

的台大中文系葉嘉瑩、東海中文系徐復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等學者，或許都曾有過想要串聯東／西、銜接台／外的雄心；但終究沒有一位能像顏元叔般，自在悠遊於中／外文系所及學院內／外，貫徹教學改革意志、引領輿論走向並屢獲傳媒矚目。

顏元叔常輕易顛覆人們對「學者」的傳統刻板印象。他後來決定替《皇冠》雜誌撰稿，投身通俗讀物市場，毅然「轉型」為擁有 17 冊作品的知名散文家。從今日學術界與一般讀者的反應來看，他的散文數量與成績顯然被雙重低估了——或許評論也是？昔日顏元叔曾精品細讀過不少台灣文學作品，今日該輪到我們來重新細讀顏元叔了。

楊宗翰 東吳大學中文系、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兼任助理教授。著有《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台灣文學的當代視野》，編有《逾越：台灣跨界詩歌選》、《跨國界詩想：世革新詩評析》等書。